

1907年 中国纪行

[俄] 米·瓦·阿列克谢耶夫 著
阎国栋 译



中国大探险丛书

1907年 中国纪行

[俄] 米·瓦·阿列克谢耶夫 著
阎国栋 译

耿昇 主编
马大正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07 年中国纪行 / (俄) 阿列克谢耶夫著; 阎国栋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中国大探险丛书/耿昇、马大正主编)

ISBN 7-222-03188-X

I. 1... II. ①阿...②阎... III. 风俗习惯—中国
IV. 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0789 号

中国大探险丛书

1907 年中国纪行

- 著 者** [俄] 米·瓦·阿列克谢耶夫
译 者 阎国栋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鞠洪深
出版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2-03188-X/Z·397
定 价 22.80 元

Академик
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В старом Китае
(Дневники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год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8г.

根据苏联东方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译出
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得到了作者女儿、
版权继承者 М·В·班科夫斯卡娅女士许可。

前 言

马大正

19世纪中叶以后，在日趋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中国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者既无法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也无能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人侵，强盛一时的清王朝的衰亡已不可逆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对海外殖民地分割完毕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考古探险热潮。在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下，众多的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冒险家纷纷涌入中国，进行考察和探险。他们每个人所抱的目的不同，方法各异，但正是在这些探险考察活动中，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批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相关札记和游记。今天，人们面对这样一份值得研究的历史资料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利用呢？

首先，有相当一部分的考察报告是当时的现场实录和实地测量的第一手材料，尤其对那些一经破坏性发掘后即被西方殖民者洗劫一空或历经战乱已荡然无存的中国古代文化遗迹来说，这些记录就越显珍贵，对相关学科的研究有着基础材料的重要价值。

其次，大量的札记、游记类作品中，尽管有的因作者政治观点和立场不同，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有的因行色匆匆，道听途说，对事物的认识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由于作者是当事人或同时代人，他们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对当时当地的社会风貌、民族民俗、宗教、地理以及重大历史事件所进行的描述和记录，仍为人们从一

个侧面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研究参考价值的史料。

第三，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外国探险家们在中国的考察活动，曾是西方列强进行殖民侵略的一项内容。因此作者在记述中有意无意都涉及到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有的更直言不讳对中国资源、文物的劫掠和盗窃，这就为帝国主义侵华史中那段令国人深感屈辱痛心的历史留下了真实的记录。

长期以来，这些相关著作或因深藏国内外书库而难以觅见，或因涉及多种文种而不易为人们阅读，难以为研究者所利用，更无法进入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了迫切需要利用此类图书的研究者和关心此类题材读者的遗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推出“中国大探险丛书”正是为弥补这种缺憾，为让更多的读者利用这份历史资料创造条件。

“中国大探险丛书”选题范围以19~20世纪上半叶外国来华各类人士所撰的报告、游记、笔记为主，包括整个中国的范围，侧重于中国的西部；

“中国大探险丛书”只收探险者本人亲历纪实，内容力求客观、真实，并兼顾知识性和可读性；

“中国大探险丛书”译文力争信、达、雅，一般不作删改，以保持原作风貌；

“中国大探险丛书”每种选题均邀请译者或专家撰写一篇导读性前言，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生平、著作写作背景以及本书的价值所在。

外国探险家有关中国的考察实录近年汉译本已不在少数，我们由衷希望本丛书能为读者扩大阅读面提供一个新的侧面。

果若如此，斯愿足矣！

2001年3月31日

于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 2 —

中文版前言

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 及其华北之旅^①

有少数学者不仅能够巩固前辈学人所开拓的领域，加深对其了解，而且还能够扭转其发展方向，重新阐释他们之前的科学。此书的作者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就属于这类学者。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位学者承担了这种使命，而不是其他人，其他专家和天才？这是一个永远值得深思的问题。该学者所具备的某种全新品质成为科学本身的新属性。可又是人类的哪些特性决定了他的品质呢？

“要直视人世间的一切，而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并轻信那些无稽之谈。”——这是阿列克谢耶夫在40年代末对学院新生所讲的话，那时的他已年近花甲，这既是他的欢迎词，也是临别赠言。“直视”似乎很容易做到。但是，这件最简单的事情却不是认识的底层，而是顶峰。直视的目光中没有成见，不故作姿态。这大概是阿列克谢耶夫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但这又是什么呢？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决定的，还是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有一些幸运的人可以像踩着跳板一样青云直上，迅速

^① 本文为该书作者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女儿 M·B·班科夫斯卡娅女士与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所作。他们应译者请求，专门为该书中文版撰写了前言。——译者注

达到目的。尽管阿列克谢耶夫没有这样的童年，但他生命中的许多东西却是由他的童年所决定的。1881年1月2(14)^①日他出生在圣彼得堡的一个工厂区。普希金曾这样描写那时的圣彼得堡：“贫穷的城市，禁锢的灵魂……。”他的父亲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是一个没有专长的工人，晚年曾在一家弹药厂做抄写员。家里有许多孩子，但只有瓦西里和哥哥格奥尔基长大成人。家中非常拥挤，与其他同样是工人的家庭为邻，所不同的是他的父亲没有酗酒的恶习，也不打老婆，而是把教育儿子视为生活的主要目的。所以，瓦夏^②成了初级中学的学生，他那些做仆人的朋友们因此送了他一个轻蔑的外号“小中学生”。

瓦夏10岁那年，父亲患了重病。他记得他如何在拉丁语词典中寻找“cancer^③”这个词，但那不是他的功课，而是他在医生留下的一张字条上看到的。父亲死后，母亲按照他的临终嘱托，没有听从左邻右舍要把儿子送去学手艺的劝说，阿列克谢耶夫因此能够继续在中学学习，后来他成了“有培养前途”的公费生。

他的童年岁月充斥着醉鬼们的辱骂，人们拨弄是非，飞短流长，他时常提心吊胆地面对警察，甚至对管院子的人也感到恐惧。所有这些促使他极力排斥自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愚昧现象。那些黄昏时光成了他童年唯一的欢乐，备受野蛮生活折磨的人们（大部分不久前还是农民）聚集在厨房里的炉子旁边，突然变了样子，他们尽情歌唱，讲述故事和传说，这些都深深地留在他记忆和心灵之中。他获取美学感受的另外一个源泉是教堂活动（早在上

① 两个日期分别为俄历与公历。——译者注

② 阿列克谢耶夫的小名。——译者注

③ 拉丁文，意为“毒瘤”。——译者注

中学时期他就被吸收进当地的唱诗班，然后又在教区的教堂里认真而准确地朗诵圣经中的诗篇，大部分词句一生都未曾遗忘)。瓦西里耶夫本人认为那种儿童的宗教热情并不具备宗教基础，而仅仅是摆脱苦难生活的一条出路。

尽管家庭未能给予他任何早期教育，但却教会了他劳动的本领以及只有劳动者才拥有的信念，那就是，生活不是游戏，要凭自己的良心去工作，而不是因为恐惧才去做，只有这样，才能度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也可以这样理解，小男孩天性中蕴涵的渴求知识的欲望在童年时期从没有得到过满足，所以，这种“吃不饱”的经历后来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饥饿”，促使他不知疲倦地“吞食”无穷无尽的知识。他才能出众，在中学获得了古典语言“行家”的声誉，与此同时，他还迷恋数学课，并且一生都感到他只有一种要献身科学的总体志向，而非局限于个别领域。他认为，这种总体志向就是系统思维的本领和需求再加上工作能力，而所有的科学都是有意义的。他自己承认当初对东方研究没有丝毫偏爱，而且也一无所知。他听从了一位中学老师的建议，决定进入东方语言系学习。选择专业是用拈阄的方式决定的：阿列克谢耶夫抓到了一个写有汉满语专业的“阄”。

他于1898年考入的圣彼得堡大学令他大失所望。19世纪俄国汉学巨匠瓦西里耶夫已处于其生命和活动的后期。他所创立的学派为科学研究中国奠定了基础，尽管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就，但也存在有目共睹的不足。这些不足首先从总体气氛中就能感受出来：阿列克谢耶夫悲伤地回忆到，教师们没有对新入学的学生表示欢迎，反而劝阻他们。教师们认为，抽象地研究中国无异于虚度光阴。

教学方式也与中学一样：“……在完全不懂文本意思的情况下死记硬背，语法没有规则和明确的思想，毫无意义的翻译令人惊讶……丝毫没有大学的味道，也没有上过

任何导论课程。”众所周知，对年轻人影响最为敏感的大学生圈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些不加掩饰的仕途追求者（那时，经哈尔滨到北京的东清铁路开始建设，愿意进入汉语专业学习的人很多）。他们将大学课程看作是要花费4年时间的必要环节，以便最后拿到文凭——稳固的美差。阿列克谢耶夫在自传中写到：“我的同学们说服我相信唯一重要的课程是……英语，对外交官的实际生活大有用处，——而学习其他所有课程只是为了得到文凭，——不知为什么，我却没有领会这些神机妙算，全然无私地奔向一个目标，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攻克文本障碍……。”

有必要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不知为什么”。确实应该思考一下，这个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最看重生活“安排”的环境中，可他怎么会对所有实用倾向表示顽强的抵制？这是科学热情吗？“不知为什么”……后来，阿列克谢耶夫将“科学热情的严肃性”作为评价学生的标准。按照他的意见，“科学热情的严肃性”是不能伪装的。难道，这就是他对学者志向的定义？这种志向如同音乐家和画家的志向一样特别。

从许多阿列克谢耶夫的自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起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曾为这个“不知为什么”而痛苦和茫然（在他的日记中，这句话重复了许多次）：他曾为在得不到必要帮助和指导的情况下克服汉语的巨大困难而茫然，也曾为缺乏某种科学前景而茫然。在感到茫然的同时还要为“随处破灭的灵感而苦恼”。4年顽强劳动换来的是：“不具备阅读所需的外语水平，就连汉语也没学会，而且，这种糟糕的情况非常可怕和明显，不能理解任何一个长句子的意思。”……但是，毕业后他仍然没有选择那条更为轻松、也更“有油水”的生活道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进入外交部工作的机会而留在了大学。

当然，大学岁月中也包含了一些很大的成功。阿列克

谢耶夫总是对他的老师以及曾帮助他“得见光明”的师长们心存感激。也曾有过令人幸福的同学关系，也曾有过在大学图书馆里“疯狂”苦读的夜晚。他也曾沉迷于具体的科学材料：他受邀在皇家艾尔米塔日博物馆整理中国和日本钱币藏品时，发现了钱币形状的护身符——中国人挂在脖子上用来避邪的铜铸牌子。无论在图案中，还是在题字中，都包含有许多符咒和各种各样的祝愿，充满有意设计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玄妙，要搞清楚这些是当时力不能及的事情，这也是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民俗和民间宗教产生兴趣的开始。

1904年，阿列克谢耶夫被派往欧洲继续为开始授课做准备，同时进行教学法方面的提高。在这件事情上，他的老师、著名印度学家、科学院院士鄂登堡起了决定性作用。他是俄国东方学杰出的组织者，一直致力于“将俄国东方学欧洲化，将俄国东方学纳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架构”。鄂登堡几乎同世界东方学界的所有人相识，给阿列克谢耶夫写了一大堆介绍信，帮助他与欧洲学者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在大英博物馆里，他完全着了迷：“简直难以想象，我是如何神魂颠倒地醉心于这个对我来说全新的世界，这与靠阅读古典格言枯燥无聊地苟且度日大不相同。”在博物馆的钱币部，阿列克谢耶夫研究了钱币型护身符，越来越倾向于以此为题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蕴涵其中的古老传统，要想将其阐释清楚，不仅需要具备渊博的文学知识，而且还需直接认识这个民族，因为那些传统至今还在这个民族中流传。阿列克谢耶夫能够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因为欧洲的工作结束后他将去中国进修。

巴黎时光是阿列克谢耶夫国外学习的高潮期。在法兰西学院，他听了著名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中国历史讲座，

跟随鲁斯洛^①神父开展语言学研究。沙畹的讲课征服了他：“每次听他的课我都能获得许多思想……对我来说，做沙畹的学生是一种永远愿意体验的美好享受。”

在柏林的民俗学博物馆，阿列克谢耶夫观看了圣彼得堡大学前毕业生威廉·格鲁贝^②带回的藏品，同他讨论了中国民间艺术和宗教的题材问题。得到沙畹赞同的关于护身符的题目的范围不断扩展。

在语言（英语、法语、德语）学习上的成绩是阿列克谢耶夫在欧洲期间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他能够用这些语言讲课、翻译、通信。尽管阿列克谢耶夫具备语言学习所需的所有天赋，但对于在童年时期没有获得任何语言积累的他来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一件趣事可以说明他通过全神贯注的学习而取得的成绩。在伦敦期间，阿列克谢耶夫驾御“词汇”的能力令英国人感到窘困，除了所谓的语言学知识带来的方便外，在古典中学学到的拉丁语帮助了他，使他随时可以用拉丁词根造出新词来。

当阿列克谢耶夫步入晚年后回顾自己开始科学工作的那些年头时，他做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总结：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4年，然后按照自己制订的广泛计划学习了两年，接下来是在欧洲的两年。照他自己的说法，这8年仅仅是他在中国获得新生的准备期。在中国，他在思维方式和文化修养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转折”。这种转折有时是痛苦而艰难的，但最后却总是幸福的。

从1906年秋天起，阿列克谢耶夫开始了在中国的学习生活。在先生们的指导下，他开始紧张地阅读古典文

① 鲁斯洛（1846～1924）：天主教神父，法国语言学家。语言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为实验语音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② 威廉·格鲁贝（1855～1908），德国汉学家，第一部德文本《中国文学史》作者、《封神演义》德译者。——译者注。

献。他在从北京写给鄂登堡的信中说：“……早就想给您写信，但因为忙于背书，连写信的时间也没有。每天学习12小时，可我还是不满意，总是积压着需要紧急处理的事情，而且经常都是如此。……我有4个老师，对他们都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到：“先生们竭尽全力，总之，我的工作进展顺利。一位先生说：‘与喜欢干活的人一起干活是愉快的。’”在准备晋升教授期间，阿列克谢耶夫在中国，就像他早先在圣彼得堡、而后在欧洲一样，继续按照自己制订的最广泛的计划学习，内容涵盖了汉学文献以及数量巨大的原版中国古典著作。先生们的参与有助于加深对阅读内容的理解，但却不能帮助他掌握文本。具备阅读复杂的汉语文本的能力不仅对于学习古典作品是需要的，而且对于阅读报纸也是必须的：20世纪初期主要使用古代书面语言——文言，所有的文章都用文言写成，看报纸并不比阅读本世纪初的论著轻松，有时甚至更加复杂。阿列克谢耶夫遇到了许多困难，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没有松懈。而且，丰富的民俗学资料燃起了他从前对民俗学的兴趣，他立刻以他那特有的热情沉迷于资料收集，并将其变成整个科学活动最重要的方向之一。

首先对他产生吸引力的是春节前印制的彩色版画——年画。好在这种画价格低廉，阿列克谢耶夫立即开始大量采购，搜寻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必须要搜寻，寻找出售这种货的小铺子。此外，年画只在某些月份前（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前）出售。

要获得对这些充满象征意义的画的阐释同样困难。阿列克谢耶夫明白，必须在当地搞清楚这种鲜活的材料，否则以后没有任何文献可资参考。比如，一个快乐奔跑着的儿童，一只脚光着，另一只脚上穿着草鞋，这表达了一种愿望：风调雨顺。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呢？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曾琢磨过一幅类似的画。那幅画是偶然进入

大学里的，但他对画上的内容百思不得其解。中国讲师看了一眼这幅画后只是轻蔑地笑了一下。而现在先生们也流露出同样的表情，对这个古怪的年轻人的行为大惑不解。他不似其他外国人那样游玩，而是走街串市寻觅那些他们认为是粗制滥造的便宜画，然后还要纠缠不休地问这问那。最后还是这个怪人的顽强精神占了上风，他用自己诚挚而永不知足的探索精神征服了先生们。有时还得做点交易。当他获悉一位先生在翻译一些德语文章时遇到了困难，就提出愿意效劳，但条件是后者必须用对年画内容和象征意义进行书面解释来交换。当遇到难点的时候，先生们就请不识字的老妪来帮忙，因为她们从小就从画和刺绣上了解了其中的所有奥妙。

画上也有与护身符上一样的图案，阿列克谢耶夫立刻用它来充实已经收集到的材料。另外一个材料来源是大量的街头题字——中国特有的日常题铭。阿列克谢耶夫从黄色和红色的纸上抄写那些用来装饰住房、寺院和衙门门框和阳台的书法楹联。解释清这些吉祥的句子又成为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其中既蕴涵着文学佳作，也有民间传说。用耳朵捕捉民间口头创作就更难了：阿列克谢耶夫记录了商贩的叫卖声、盲人在大门口乞求施舍的唱词、摇篮曲和儿歌。其中摇篮曲和儿歌是在熟人家服务的一位中国保姆应他请求而唱的。

应该指出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在北京大街小巷搜寻年画和题字，寻访并请教懂行的居民，参观庙宇。与此同时，他一直跟随先生学习，独立阅读书籍，而且还经常而系统地研究汉语语音学，这在法兰西学院时就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阿列克谢耶夫是第一位用实验方法（而不是用描述的方法）对汉语进行研究的汉学家。在中国期间，他一边努力获得准确的发音，同时继续自己的实验（为此他还从一个外国牙医那里订购了一个人造上颌，这是鲁斯

洛仪器糟糕的仿制品)。

当您了解了阿列克谢耶夫所从事的大量工作和感受时，便会明白，尽管他取得了飞速进步，可为什么他还是感到面临的任务（尽管许多任务是自己确定的，但这不能改变什么）难以攻克，强烈需要得到真正的科学指导。此时此刻，又一个幸福的意外机遇使他得以和沙畹重逢：1907年5月10日，他在环绕北京的城墙边迎接了自己不久前的教授和偶像。

沙畹肩负科学使命而来：这位研究司马迁（公元前2~前1世纪）《史记》的出色专家和译者现在想实地考察汉代遗迹。阿列克谢耶夫请求允许他加入考察团，沙畹热情地同意了。他们雇佣了摄影师、拓印师（做石碑拓片的师傅）、仆役。5月16日，队伍离开北京城。阿列克谢耶夫的旅行就这样开始了，为此他共学习了8年多的时间。尽管后来于1909年和1912年他又在中国南部和沿海地区旅行过，但他只把这一次、自己的第一次旅行称作“是可贵的阅历，其意义不可低估”！

但是，旅行不仅仅是一种阅历。读者们将会发现，旅行始终伴随着紧张的科学劳动并且成为俄国汉学史上职业学者进行的首次旅行：从前曾在中国旅行过的俄国人中没有一位是汉学家。

沙畹仔细研究了大量考古文献，考古活动是按照他预先制订的线路进行的。他们的旅行轨迹是从一处古迹到另一处古迹，主要是一些石碑，上面刻有中国北方常见的公元前后交替时期的图案和文字。拓印师老宗叮叮当地挥动着拓锤，“印刷”覆盖在涂满墨汁的石头上的纸，敏捷地做出拓片。尽管古代石碑拓片已经不属阿列克谢耶夫所研究的民俗学范畴，但同样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西安“碑林”是一个独特的博物馆，那里收藏有1000多块碑碣，其中有些碑上刻有十三经的全文（公元9世纪刻），

这在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中有记述：“我谈妥了购买这些碑碣的成套拓片。这将是欧洲第二大收藏。想到我将拥有一套这样的拓片，不禁热血沸腾，收藏家的癖性发作了！”后来，阿列克谢耶夫用碑林的拓片材料写了两篇文章，可见他的兴趣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读者将会看到，同老百姓直接接触对阿列克谢耶夫来说可谓得心应手。他本人认为他能够轻松自如地谈话的原因是他不怕“鹦鹉学舌”——直接而公开的模仿。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入他人世界时保持心理上的轻松，这种轻松是由阿列克谢耶夫的出身所决定的：他同农民、车夫、和尚们交谈，不受其志趣所感染，而是平等地与之交流，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心事。20年以后，在派自己的一个学生前往中国时，阿列克谢耶夫为他制订了详细的任务，其中除了大量的科学指示外，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话语：“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中国人当作一个民族学研究对象来解释，要平易近人、真心实意地对待他们。”

两位旅行者的科学追求有时相同，有时不同。从阿列克谢耶夫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所有令沙畹着迷的事情，他在行进过程中（也就是当他们在漫长的道路旁走着的时候）激动地与自己的同伴所谈论的事情，都能够得到对方最热烈的回应。但是，“使命的双重性”有时不可能不导致一些分歧：吸引沙畹向前的是野外考古，而阿列克谢耶夫则很想在城市多呆一段时间，这里既有年画，也有题字，还有庙宇。此外，颠簸的马车，4个月的艰苦跋涉，不可避免的路途变故，都是对性格实实在在的考验。这对阿列克谢耶夫非常艰难，他没有得到过抑制感情的训练，对所发生事情总是反应强烈（他经常为此而痛苦，特别看重人的忍耐力和教养）。就连不苟言笑的沙畹也难以永远固守本色。尽管如此，“危险”场面总能得到化解，不致演变为争吵。阿列克谢耶夫在日记中消除了对“性急的书

呆子”的愤怒，接下来写到了对沙畹的感激之情，与之进行的科学对话好似甘泉滋润着他。“我与沙畹久久地、饶有兴趣地交谈……我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教诲”，“我们友好地高谈阔论”，等等。阿列克谢耶夫一直对自己的法国老师心存感激，将他与自己的俄国老师一样看待：“我非常感激他，他给予了我一个教师通常给予学生的一切东西，更主要的是，我为自己建立了一系列科学目标，获得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更准确地说，是沙畹指导了阿列克谢耶夫，而不是领导了他：“我很幸运能与沙畹相识，但我走的却是一条独立的道路，对广泛的文化问题进行研究。”这里既有感激，也包含了对自己独辟蹊径的清醒认识。

当谈到一个学者的旅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旅行（行在旅途）本身只是巨大劳动的可见的外在部分，其基础则是所受到的培养，即教育，而其任务则是研究，从收集和整理所收集到资料开始构建自己的研究。回到北京以后，阿列克谢耶夫恢复了对中国文学和语言的学习，同时顽强地、几乎每天都在整理自己的收藏以及包含有各种民族学信息的大量的汉字题字。他重新开始同先生们以及许多专家工作，他们依照阿列克谢耶夫专门制订的民族学征询表给予他清晰的阐释。学习的成果是数百张布满先生工整汉字笔迹的纸张，其中包含了非常独到的信息。阿列克谢耶夫收藏的500幅年画得到了描述，解释了各种象征意义，转述了神话和传说、戏剧和文学情节、道德说教、行为准则、迷信预兆等等。阿列克谢耶夫收集到的日常金石学和寺庙金石学材料与年画题材桴鼓相应，因为“中国的民俗和宗教很容易合而为一，不大可能区分清楚”。

这样，整理各种各样材料和旅行成果几乎成了阿列克谢耶夫科学积累阶段最复杂繁重的劳动。应该说，在世纪之初，当他从事这项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任何有关他